



人文经济学：重塑共同富裕衡量尺度与实践路径

杨文圣 熊文军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长期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主导着各国政策制定与发展评估。然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反映社会福祉、公平正义、生态环境与人民幸福感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无法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在2023年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时就明确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

科学构想。这一科学构想与人文经济学在核心理念上有着同构性。人文经济学认为,共同富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促进人的能力提升、价值实现与自由全面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衡量共同富裕的尺度必须包含人的发展维度,包括教育机会、职业技能、健康水平、休闲时间、社会参与等多方面能力指标。同时,社会和谐与生态宜居也是衡量共同富裕不可或缺或缺的尺度。人文经济学所蕴含的“和合共生”智慧与民本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尺度。

二、创新机制 人文经济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方位

人文经济学不仅重构了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还通过一系列创新机制,为共同富裕,特别是精神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方位。这些机制将文化资源、人文价值、道德理念融入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使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协同推进。

一是文化资源转化机制。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创新激活经济内生动力,通过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一方面推动文化经济化,持续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化,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人文内涵与附加值。这种双向转化机制,使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属,而是经济发展的灵魂,有效黏合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营造出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环境。

二是人文教育赋能机制。人文经济学重视崇文重教传统,通过教育普及促进人的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科技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的融合发展,需要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崇文重教氛围的营造。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将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特别是注重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协同培养,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活力。

三是文化生态营造机制。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红色革命思想文化,不断提升人民精神文明素养。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持续营造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提供多元优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满足差异

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文化生态营造既包括实体文化空间的建设,如富含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天津古文化街,也包括制度环境价值观念的塑造。通过文化生态营造,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也使共同富裕具有更深厚的文化根基。

四是城乡协同发展机制。人文经济学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创新,通过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共同富裕的全面实现。这种城乡协同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互补,更体现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的文化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生活方式,通过良性互动,可以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路径选择 推动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与实现机制落地

从人类文明互鉴的角度看,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辩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而来的,其以文化和经济的双向驱动贯穿始终,进而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现代社会危机反思中,西方学者的一些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启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本质上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理性的铁笼”:我们越来越擅长如何做事(工具理性),却逐渐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价值理性),人被困在追求效率与计算的系统之中。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晚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不平等的灾难》中对GDP这一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提出了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论调背后的价值理性危机。他认为,当一个社会将GDP增长率奉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并相信与之配套的消费主义、竞争公正等谎言时,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人文价值的失落。

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征程上,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的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值得我们警醒,也为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参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国家发展蓝图时,将扎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重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创造性突破,它强调发展要回答“为了谁”、制度要体现“依靠谁”、成果要落实“归属谁”,通过文化赋能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围绕“人”的现代化展开。人文经济学不再将发展简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所指出的:“‘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这种发展理念的变革,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生活,使共同富裕既有经济厚度,又有人文温度。

一、尺度重构 从重视单一指标到多维综合评价

人文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衡量社会发展的全新尺度。它打破了GDP至上的单一物质取向,构建了能够全面反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评价体系。这种对共同富裕衡量尺度的重构不是对传统经济指标的简单否定,而是在肯定物质基础重要性上的超越与升华。

一是注重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的统一。共同富裕以丰裕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而物质发展的目的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文经济学强调,物质富裕并非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与条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一起,体现了两者的密切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注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是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两大核心政策目标,人文经济学为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钥匙,其强调在公平的基础上,持续提升生产效率,增加经济产出,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在衡量共同富裕水平时,不仅要看社会财富总量,更要关注财富分配的均衡度,包括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群体差距的缩小程度;这也要求政府在追求发展的“手段”上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准则,推行包容性增长,发展福祉经济。

三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对其对立面——“人的异化”和“片面发展”——的深刻批判之上的

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白云翔

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和关键引擎。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将“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进行谋划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崇德向善为鲜明导向开展文明城市建设,要求在城市发展实现根与魂的坚守、内与外的统一、人与城的和谐,其所承载的是对城市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最终以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邓小平同志关于城市建设有一个“骨头”和“肉”的形象比喻,所谓“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则指城市中满足群众生活的社会事业。其实,随着城市建设深入推进,一座运转高效、面貌良好的城市不仅要有“骨头”和“肉”,更要有“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们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就是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必须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一是要自觉“培根”,下大力气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以珍爱尊

二、风貌是城市的特色

我国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城市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居住的基本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定的城市建筑风格,中国建筑也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许多建筑一经建造,就不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代表着一种对生活的审美意趣和与自然的无声交流。特别是历经时间的沉淀,每一座建筑都在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使后人能够感受那份独特的文化智识和文化气度,进而在这种美的滋养中完善道德、丰富精神。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必须加强城市风貌管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从宏观上看,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

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建设不能“摊大饼”,否则就会滋生和助长“城市病”。要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的整体规划和管控,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从微观上看,要明确城市定位,合理规划城市建筑。梁思成先生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科学地对待城市,意味着不能一味贪大,追求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园区,忽视土地利用效率,意味着不能崇洋媚外,脱离城市既有文化传统,把城市建设变成国外城市建筑设计师的试验场;意味着不能盲目复古,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事。城市建设必须融合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契合城市外在形象和精神内质,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城市品位的整体提升。

三、人民是城市的主人

“城者,所以盛民也。”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人与人和谐相处,因此城市工作不能“见物不见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传统道德体系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不断瓦解,城市化也因此被人们视为冲击传统人伦关系的破坏性力量。但城市生活在取代传统社会生活结构的同时,也为建构新的人伦关系提供了客观条件。通过对社会文明风尚的有效引导,城市完全可以被打造为保障人伦交往条件的伦理空间,进而实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相融相生。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一是要充分发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突出位置,明确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未来,应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制度建设、技术赋能、全球传播等多维度构建实施路径,使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与实现机制真正落地生根。

一是构建多维衡量指标体系。要真正超越GDP,必须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多维衡量指标体系。这组指标应涵盖民生保障、文化供给、生态环境、社会参与等多个维度,包括就业质量、公共服务可及性、文化资源丰富度、生态环境质量、社会信任度等具体指标。通过这些指标的监测与评估,可以更加全面地“把脉”共同富裕的进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二是数字技术赋能人文发展。数字时代为人文经济学与共同富裕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通过数字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使文化资源在更广阔范围内共享,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数字技术可以大幅提升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缩小城乡文化鸿沟。

三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人文经济学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能够突破西方经济学以逐利为导向所引发的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等难题。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融入现代社会,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四是促进文明交融与全球对话。人文经济学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智慧与民本思想,又融合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优势。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特征,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通过加强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我国共同富裕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新征程上,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将文化的活力注入经济体系,将人文的价值融入社会建设,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相得益彰。唯有如此,才能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回溯往昔,无论是儒家描绘出的财富共享、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理想,还是道家提出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朴素共富思想,都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免于贫困、社会和谐、天下共享共富理想状态的孜孜追求。而今,在党的坚实引领下,我们不仅圆了全面小康的梦想,更把这份跨越时空的共富追求,绘成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以物质富足托举生活品质,以精神丰盈点亮人生价值。面向未来,这一追求会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继续生长,让每个人都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滋养中绽放光彩。

(作者分别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